

辛亥革命时期  
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

李时岳 著



辛亥革命时期  
兩湖地区的革命运动

李时岳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1957年·北京

辛亥革命时期  
兩湖地区的革命运动  
李时岳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新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4  $\frac{1}{4}$  印張 · 79,000 字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7)0.38元

統一書号:11002·119

封面設計者:袁运甫 校对者:王郅文

# 目 次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辛亥革命的一般进程	4
一	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国	4
二	革命的迅速胜利与袁世凯窃国	17
第三章	兩湖地区社会各階層的政治趋向	85
一	农民的痛苦与斗争	85
二	工人运动	41
三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45
第四章	“首义之区”的湖北	52
一	革命党人的活动	52
二	武昌起义和湖北軍政府的演变	67
三	武汉保衛战与軍政府的反动	82
第五章	革命派与立宪派斗争最激烈的湖南	91
一	革命运动的发展	91
二	長沙起义和起义后的政变	98
第六章	兩湖地区反对革命果实篡夺者的斗争	106
一	农民运动的被镇压和黑暗統治的恢复	106
二	下層革命党人的反抗風潮	114
三	兩湖与“二次革命”	119
第七章	結束語	125
后 記		132

## 第一章 导言

辛亥革命，如毛澤东同志所指示的，在比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本書企圖比較詳細地敘述兩湖——湖北和湖南地区革命發展的經過，来說明、印証辛亥革命过程中的某些重要問題。

辛亥革命这个全国規模的革命运动是以各省起义和“独立”的形式展开的。不同地区，因其条件之不同，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揭出这些特点，就可以丰富辛亥革命史的内容，更完整地显示辛亥革命史的面貌。

不仅如此。

兩湖地区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史上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的意义。簡單地說来，湖北是“首义之区”，湖北的革命分子長时期潜伏在清朝的軍隊中作士兵或下級軍官，在那里建立革命組織和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准备了起义首先在武昌获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他們的工作比其他地区的革命分子联络軍隊的工作要深入得多，可以称为典范。武昌起义的槍声，开始了全国革命胜利进軍的凱歌，武汉保衛战是反抗清政府軍事鎮压的唯一战斗，湖北人民对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但就在革命凱歌行进中，湖北的革命政权又是最先落入原来反对革命的旧人物之手的，它說明了

当时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幼稚与软弱，显露了日后陷革命于失败的征兆。湖南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斗争表现得最尖锐的地区。临时附和起义的立宪党人，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发动流血政变，杀害革命的领导者。这一事实，充分地反映了辛亥革命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矛盾与斗争以及这种斗争的趋势。

因此，考察两湖地区革命发展的经过，对于辛亥革命前革命分子是怎样进行活动的，起义是怎样爆发的，革命果实是怎样被篡夺的等问题，也就是革命如何取得一些胜利和为什么终于失败的问题，可以得到部分的而较为典型的解答。

不仅如此。

当黑暗反动势力篡夺了国家权力之后，当时革命人民，特别是下层革命党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这是一向被人忽视了的问题。在一些辛亥革命史的著作里，民国成立后，往往只看到政党政客们的排列组合、权力纠纷，往往只看到革命党的上层分子和封建官僚、立宪党人握手言欢，“咸与维新”，尽成“新贵”，却看不到下层人物的反映。似乎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失败是毫无感觉的，对革命失败后的压迫是漠不关心的。事实决不会是这样。两湖地区的情况就证明：反革命篡夺政权之后，并不是万事大吉的，他们不得不撕毁“共和”、“民主”的假幕，露出狰狞的面目来和人民作战。农民运动继续增长着，下层革命党人不断地掀起了反抗革命果实篡夺者的斗争，只是由于革命的人民得不到

革命的領導，才沒能挽救革命的失敗。

對於兩湖地區人民反抗革命果實篡奪者的鬥爭的初步探討，提供了進一步研究當時全國政治情況的線索。這個研究，將可以充實從1911年的革命到1913年的革命（“二次革命”）之間革命演變的內容和揭示革命發展的規律。

在1913年的所謂“二次革命”中，“響應”了革命的湖南，由於反革命的操縱，實際上破壞了、抵制了革命；而1911年的“首義之區”——湖北，則變成了反革命鎮壓革命的兵站與糧台。其中的教訓是發人深省的。

總之，闡明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發生和發展、勝利與失敗的真實過程，將有助於更深刻地揭示辛亥革命的發展規律及其經驗教訓。

兩湖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為說明這一部分地區革命發展的經過，不能不首先對辛亥革命的一般進程作必要的敘述。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運動雖然息息相關，但也各自具有特點，為了顯示這些特點，採取了分別敘述的形式。

## 第二章 辛亥革命的一般进程

### 一 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国

中国資本主义的發展 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新的生产力与衰朽的生产关系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冲突。

中国是世界文明發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社会的發展，和世界其他各国一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出现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中国社会按照自己独立發展的規律，如果没有外来影响，必然会發展为資本主义社会。但是，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打断了中国社会独立發展的进程。“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發展資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sup>①</sup>为了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外国侵略者对中国采用了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各种压迫手段，并和中国的封建統治者結成反动联盟，把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資本主义强盜們是極力阻撓中国在經濟上和社会生活上的进步的，然而为了侵略的必要，又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立物——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發

---

<sup>①</sup> “毛澤东选集”第1版第2卷第651頁。



展。外国的低廉商品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經濟，破坏了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手工業，“自然經濟的破坏，給資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农民和手工業者的破产，又給資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場。”<sup>①</sup>这样就給中国資本主义生产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条件和可能。

事实上，1840年的鴉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給予封建統治以严重打击以后，在外国資本主义刺激之下，一些民間工商業者便逐渐采用机器来进行生产，磚茶、纜絲、軋花、火柴、豆餅、造紙等工厂陸續出現。这些工厂都是建筑在中国已有的广泛的手工業基础之上的，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原来就进入了手工工場阶段。广州纜絲厂（1880年已有10家，1894年有30多家）、宁波軋花厂初办时多用手搖机，許多火柴厂初办时还是半手工、半机器，由手工業向机器工業發展，这應該是中国資本主义發展的正常道路。但是，由于这些工厂一般都是資本少，規模小，技术落后，在外国資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下，其發展是極其艰难和緩慢的。

从60年代起，在中外反革命势力共同鎮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基础上，以曾國藩、李鴻章为首的反动統治者开始倡行“自强新政”，最初以創辦軍事工業为中心，后来發展到“求富”——举办一些民用工業。如果說，“自强”的軍事工業，虽然使用了机器，但它（一）不是商品生产，（二）从制造、販

---

① “毛澤东选集”第1版第2卷第597頁。

运到購買，都不許人民插手，只是中国二、三千年来封建統治者壟斷軍火制造的延續，(三)工人类似封建时代官府工業的工人，压迫他們的不是資本家而是封建官府，所以并不具有資本主义性質；那末，“求富”的民用工業就有所不同了。就其由官府支配、生产有特定目标和特定需要(如左宗棠开办蘭州織呢厂的目的之一就是生产軍用氈)等方面說，仍帶有濃厚的封建性；但就其为利潤、为市場而生产等方面說，又具有資本主义性質。企業內部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矛盾及其消長，决定着这些企業的發展。封建性濃，企業变成了官僚机构，不計成本，不顧市場，便必然失敗。企業的利益要求資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經過曲折的斗争，資本主义逐漸冲破了封建主义的压制，企業由“官办”、“官督商办”而“官商合办”、而完全“商办”，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大商人通过这条道路轉化为資產階級。

如果說，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中国民族工業的發展还非常緩慢而微不足道；那末，中日战争以后，發展便較為迅速，到1905—1908年間則出現了大的躍进。1908年以后虽然又呈現萎縮，但比1905年以前还是有所增長。下列各阶段設立的厂矿和資本的总数以及各阶段的每年平均数，显示了这种發展的趋势：

民族資本主义的發展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統治秩序是不相容的。由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經濟压迫，据“國風報”的报道，1906、1907年兩年間，“民之投資于实業者若鶩”，但不久压迫又加紧，1908年

年 份	厂 矿		资 本 (元)	
	总 数	平均每年	总 数	平均每年
1872—1894	74	3	20,636,838	896,334
1895—1904	134	13	40,181,065	4,018,107
1905—1908	220	55	73,192,225	18,298,056
1909—1911	68	23	17,182,494	5,727,498
年 月 不 明	25	—	7,462,190	—
共 計	521	—	159,654,812	—

材料来源：严中平等編：中国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选輯，第93頁。

投資于实業的“已銳減”<sup>①</sup>，1909年則“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埠，向称繁盛，曾几何时，情态大异。富商巨肆，倒閉頻聞，且对于外人，負債累累。”<sup>②</sup>1910、1911年更是每况愈下，市面蕭条，物价騰貴，銀根緊迫，恐慌大起。巨大的金融風潮在1908年和1909年各發生了3起，1910年發生了8起。其中如上海正元錢庄的破產，牽動全市，其他各庄相繼倒閉，恐慌波及汉口、天津、營口和長江沿岸各埠；接着拥有17家支店的有名票号源丰潤也告枯竭，影响及于全国。1911年仅上半年便發生了5起金融風潮，其中如拥有27家支店的南京义善源票号的破產，恐慌波及上海、北京、济南、長江一帶以至福建和广东。接二連三的金風潮，深刻地显示了整个工商業的危机。梁啓超甚至指为“国民破產之噩兆”，慨嘆“来日大难，宁堪設想！”<sup>③</sup>

① “国風报”第1年第1号：“中国最近五年間实業調查記”。

② “国風报”第1年第2号：“宣統元年生計界”。

③ “国風报”第2年第14号：“国民破產之噩兆”。

为了給民族資本主义扫清道路，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統治，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但是，正如范文瀾同志所說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从民間普通工商業者上升的，因条件困难，前进緩慢，成为资产阶级的下層，在表现新社会發展的趋向上比后一个較为强烈些；一个是从地主官僚和一部分商人轉化的，因政治条件較好，資金較大，得較快的前进，成为资产阶级的上層或实力派，在表现新社会發展的趋向上比前一个更軟弱些。”<sup>①</sup>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統一的，表现为革命和改良兩条道路的分道揚鑣。

**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人民反抗斗争** 1894年，偉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創立了兴中会，第一次揭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号召，并組織了反清起义。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失敗之后，大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趋向革命，革命書报的出版如雨后春笋，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相繼成立。1905年，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等联合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宣布了“驅除鞑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主义革命綱領，創辦了“民报”，和当时的改良派——君主立宪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从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領導思想。

<sup>①</sup>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2集：范文瀾“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問題”。

民族主义号召人們为汉族的独立而斗争。孙中山指出：推翻滿洲貴族的統治，不仅因为它殘酷地压迫汉族人民，而且因为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因为它的腐朽、反动而給中华民族带来了無穷的耻辱与灾难。饱受滿洲貴族和帝国主义百般欺凌的中国人民，是充分懂得民族独立之重大意义的。先进的中国人，不仅要求建設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而且还表示了只要力所能及，將援助世界上其他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偉大願望。章炳麟在闡明民族主义的含义时說：“吾曹所执，非封于汉族而已。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于他之强民族而盜窃其政柄、奴虜其人民者，苟有余力，必当一匡而恢复之。嗚呼！印度、緬甸之灭于英，越南灭于法，辯慧慈良之种扫地尽矣！故吾族也則当返，非吾族也，孰有聖哲旧邦而忍使其遺民陷为台隶？故圓滿民族主义者，則当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处于完全独立之地”<sup>①</sup>。这种偉大的願望，閃爍着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革命思想的燦爛光輝，显示了中国人民崇高的道德心和正义感。

民权主义号召人們为政治民主而斗争。饱受封建專制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是迫切地要求民主权利的。同盟会庄严地宣布：“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sup>②</sup>

孙中山在“民报發刊詞”上写道：“今者，中国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

① “章氏叢書”，“別录”卷3第43頁。

② “总理全集”，近芬書屋初版，“方略”第2頁。

不可以須臾緩”<sup>①</sup>。說明鬥爭的目標是推翻清朝統治、廢除封建制度——異種之殘、千年專制之毒和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外邦之逼。但是，當時的革命者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認識還比較模糊，對帝國主義勢力也有所畏懼，而且以為只要推翻清朝，實行民主，中國就強盛了，帝國主義也就不會侵略中國了。因此，為了首先專力推翻清朝統治，他們曾幻想避免和帝國主義正面衝突以及得到漢族封建勢力的支持。

民生主義號召人們為幸福生活而鬥爭。按照孫中山等人的解釋，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它表明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在西方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社會主義則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世界。因此中國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向西方借取了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戰鬥旗幟之一，為的是不讓自己看見自己鬥爭的資產階級的狹隘內容。但是，中國的客觀條件並沒有達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民生主義幻想不經過資本主義而達到社會主義，實質上卻是中國資產階級希望他們的共和國能夠和人民，特別是農民建立良好關係而獲得長久的壽命，不致在革命以後不久又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從民生主義思想中所得出的平均地權、土地國有，事實上也就恰恰是反對封建主義的“純粹資本主義的、最大限度資本主義的土地綱領。”<sup>②</sup>

這樣，就構成了中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完整的思想體系。

① “總理全集”，近芬書屋初版，“雜文”第13頁。

②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人民出版社，第29頁。

它号召人們为独立、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期望中国经过革命以后，不仅变成一个独立的“民族的国家”和民主的“国民的国家”，而且变成一个人人都过着幸福生活的“社会的国家”。“三民主义”的号召，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同盟会成立后不到一年，会员人数迅速扩展到万人以上，内地各省相继建立分会(可考的有广西分会、江苏分会、南京机关部、湖北分会、大连辽东支部、福建分会、湖南分会、河南分会、贵州分会、广州机关部、陕西分会、山西分会等)，在全国广泛地撒开了革命的火花。

同盟会不仅安排了宣传和组织工作，而且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例如1906年在萍乡、瀏陽、醴陵地区的起义，1907年在潮州黃崗的起义、在惠州七女湖的起义、在欽州和防城的起义以及在欽州、廉州和上思一带的游击战，1908年襲取河口的战斗和在安庆的新軍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軍起义和1911年在广州的起义等。連續不断的起义振奋着人心，起义者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尊敬，激發着人民的革命情緒。

二十世紀初年，中国的統治者業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清政府为了繼續維持其反动統治，把中国的一切主权都零售賣給了帝国主义强盜。于是，上海外灘(帝国主义銀行所在地)掌握着中国的經濟命脉，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館所在地)成了中国的太上政府，整个国家在走向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發着人民的爱国义憤。1903年

爆發了反对俄国强占东北和反对法国侵入广西的“拒俄”、“拒法”运动；1904年末和1905年初，爆發了反对美国虐待中国工人的运动，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北等省市的学生和工商業者紛紛举行集会，宣布長期抵制美貨。当时俄国駐北京使館为此而發出的电报中指出：“中国人表现出出乎美国意料之外的一致。……这是中国爱国心和团结的情緒日益高漲的表现，这种表现給欧洲人造成的威胁远胜于义和团运动。”<sup>①</sup>

人民和清朝統治者在对外立場上日益形成了尖銳的对立。“拒俄”、“拒法”运动的参加者一律被清政府加上“革命党”的帽子，下令“密拿严办”，“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抵制美貨运动也遭到清政府严令禁止。

更尖銳的斗争發生在矿权与路权問題上。人民反对外国人控制中国各地的矿山与铁路，也就不能不直接和清政府的卖国政策相冲突。山西人民为反对將矿权出卖給英国資本家曾进行長期、激烈的抗争，警告統治者說：“倘政府及官吏仍用其不正媚外之手段，剝奪晋人脂血以授外人”，將“以炸裂彈酬之”<sup>②</sup>。1907年在江苏、浙江等省展开了反对英国資本家建筑宁波—苏州铁路的巨大風潮。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不断增長着的反对借外債修筑铁路的运动，到1911年在四川則轉变为群众的大規模武裝起义，并成为辛

① 轉引自“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2期；亞·杜宾斯基“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② 1907年3月28日“申报”。



亥革命的导火綫。

和爱国运动发展的同时，广大地区蔓延着群众反对封建剥削者的斗争。飢民暴动、抗捐抗税暴动、会党起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所在皆是。据黎澍的统计，仅1910年就发生飢民暴动八十次。<sup>①</sup>整个中国燃烧着人民反抗的火焰。

同盟会的缺点在于没有积极地去领导这些斗争，但由于革命宣传的长期的影响，群众中的某些反抗运动仍然达到了有觉悟有组织的民主运动的水平。正如1908年列宁所估计的，“新精神”和“欧洲思潮”在中国的猛烈发展，旧式的暴动必然会进而为觉醒的民主运动。<sup>②</sup>

**君主立宪运动和清廷的政治危机** 资产阶级的上层是害怕革命的。他们一方面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压迫，怀着相当的不满情绪。以厘捐为例，张謇就曾对张之洞说过：“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叛其上者非人理”<sup>③</sup>。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侧身于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复”<sup>④</sup>，反对民主革命。矛盾的地位决定了他们走上向清朝下跪请愿，要求君主立宪的道路。

① 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第26页。

② “列宁全集”，俄文本，第12卷第306页。

③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第5页。

④ “新民丛报”第4年第10号“暴动与外国干涉”。